

# 古代中国文化 与中国知识分子

胡秋原 著

中华书局

## 大陆版序

《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》为先父胡秋原先生精心力著之一。原书完成于1954年,1956年1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。一时洛阳纸贵,旋于1958年增印;同年9月三印,均一售而空。其后胡秋原先生得将本书版权收回,1976年将全书重新编辑增修,并加增索引、图片及地图,于1978年4月由其成立之学术出版社在台北发行增订之第二版第四印,旋又于1989年2月发行第四版第六印,不久即又告售罄,现已绝版甚久。由本书在港台出版之历史,可知此书实为一重要学术著作。今承北京中华书局以1989年发行之第四版第六印为蓝本,将本书重新编排,出版发行大陆首版之《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》,以饕中国大陆学界。

《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》之特点在本书初版时之介绍中,有十分贴切的说明:

……此书就形式言,是一部中国通史的古代篇;就内容言,是一部古代中国文化史——一部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与创造活力为中心主体的旧史识……就研究方法言,则是一部比较文化史。作者运用了“同时比较法”,比较东西两方在同一的年代中,有关科学、哲学与文学之水准的高低……本书于两汉史用力最勤;而以西域之开拓与交通史,成就最大……本书作者胡秋原先生,于学无所不窥;尤以对历史与哲学之研究,涵濡最深。所著《历史哲学概论》、《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》、《中国之悲剧》、《中国文化之前途》及《世纪中文录》等,久为学术思想界所推重……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最努力的一大贡献,我们谨以兴奋感激之情,介绍本书于读者之前。

现在我们也以兴奋感激之情,介绍本书于大陆读者之前。

先父胡秋原先生1910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,2004年逝于台湾省台北县,为一强烈之民族主义者及爱国者。因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

中国而放弃继续在日本完成官费大学学业，在上海开始其终身之笔墨生涯。因蒋介石对日之“不抵抗主义”，而参加1933年之福建事变反蒋，失败后流亡海外。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返国参加抗日战争。1950年后定居台北。生前在台湾首倡两岸和平统一，1988年春与友好组织“爱国统一联盟”，并于同年秋以八十高龄之身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冲破重重阻挠，亲赴北京及大陆其他城市，为呼吁国家之统一奔走月余。此行由家母敬幼如女士陪同，采禾随侍，曾被誉为“破冰之旅”及“胡秋原震撼”。此后，先父即屡与采禾商量将本书在大陆出版以飨大陆同胞之愿，频以出书事宜委重任于采禾，更于遗命中嘱之。对其著作在大陆发行之指示与交待为：“文字可以删节，不得修改。”

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之大陆首版《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》即是遵守先父遗命与原则而进行，以新貌与读者相见。除以简体字横排，及相应之排版、标点等调整外，尚有以下之处理：（一）为遵循中国法律、行政法规与国家政策，在内容上，与本书主题无关之处加以适当之删节。（二）为保留本书出版之历史原貌，大陆首版节录了原书之四篇序言。（三）凡由于原文之删节而编者必须增加之字词或说明，均以【 】括之，以别于原作者之文字。（四）1949年以前之纪年依照原书，其后之纪年改用公元纪年。（五）由于版次之变化，页码提示与标题均有相应之更动调整。索引部分，人名、地名、事名、书名、外国人名按简体字笔画重新排序，并有所修订；页码作相应变动。所有插图照录原书，但增补其遗漏之图版页码及图片注释。以上各项均不另作说明。

胡秋原先生巨著《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》在大陆首次出版发行，首先要感谢北京中华书局和历史部编辑同仁。一年多来，各位编辑为出版本书忙碌，耐心敬业地筹划，精心精密地编辑，在此特别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谨以本书在大陆发行的首版，叩献于先父胡秋原先生灵前，作为他今年百年冥寿之献礼。

胡采禾谨识

2010年元旦

## 第四版序言【节录】

我曾想将我的思想和心力，集中表现于一部中国通史之中，这一部书是此通史之古代篇。第一版出于二十年前，绝版已久，现在我自印第四版，特略【作说明】。

### 理论历史学

我为求解决中国出路而求一可靠的理论，经过三时期。开始是社会史论战时期，我依据及修正唯物史观，此即《中国社会文化史草书》。其次，民国二十四年后，我自立系统，此即《历史哲学概论》。最后，经抗战、二次世界大战，经【国共内战】与美俄冷战，以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对世界史再为比较研究时，对《历史哲学概论》有所补充，乃有我第三期的理论，即本书所应用的理论。此是综合一、二两期之见解再加整理的，自更周到而有概括力，可谓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。此简述于本书首节，散见于全书，亦曾在其他地方先后说及。此处是其纲要。

一、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，因而为历史的动物。人类除生物的需要外，尚有德性（价值判断，美善观念，同类相亲）、理性（知性，同异辨别、关系连络）之能力。二者是文化创造之原动力，使人类有创造文化之可能；而环境对需要之供给有利的机会则使此可能成为现实。文化指人类一切德性与知性之制作或创造，包括技术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，及一切学艺之系统。文化与文明可作同义解。文化使一定人群结成一定的生活方式，这也是他们应付环境的工具，发展人类性能，实现更大自由之工具。人类创造文化以后才由自然进于历史，故人亦为历史动物。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才由先史时代进入历史时代。当一定之语言及其文化将不同的部落结成民族时，文字更加固定之。人类史即文化史，亦即各民族文化生长、变动、交涉、竞争之过程。

二、内外构造与因革损益造成文化之变动。所谓环境，包括各民族内外两方面之构造。外部环境有自然、国际关系；内部构造即各民族之人群及生

活于其中的文化形态(技术、制度、学艺)。此内外因素是不断变动的(例如内部人口之增殖,外部生活资源之丰啬,友敌民族之出现)。这便引起新的问题,需要这民族之人群采取新的行动以解决之,而此解决,亦即对其现存社会状态,通过其固有文化而采取因革损益之手段。此因革损益造成文化创造,即文化生长与变动之过程。在文化变动中,思想是最能动的因素,唯其效果亦受一般文化状态之节制。

三、文化兴衰与社会治乱。一社会内外形势经常在变动中,亦在相互作用之中。种种因素相生相克,对文化创造形成有利与不利之结果。内部的技术、制度、学艺三部门是否调和,造成创造力之强弱,以及因革损益之成败(适当与否)。此强弱、成败与外部环境之有利或不利相合,则影响文化成长之迟速、兴衰。而文化之兴衰,因而因革损益之成败,则积成社会国家之治乱。而此其结果,亦由全社会全民族承受之。

四、民德士气是一国文化创造力之保障。一社会之道德心以及理智状态为创造力之原动力,二者亦互相作用,但道德更为重要,因道德衰落后,理智亦必麻木而错误。在一社会之技术(人与自然)、制度(人与人)与学艺(人与自然、人)之三部门中,对技术与学艺起维护、协助之作用,而保持二者之调和者,毕竟有赖于制度。三者并非抽象概念与物质,而是有人主持及活动其间。主持及操作制度者是统治集团,主持技术及学艺者是知识分子。当一社会道德心强盛时,不仅保持社会之内在亲和,而且相互关切共同之利害,因而尊重学问与人材,新的思想与观念,因而调节制度技术学艺之调和,而有文化之兴,国家之治。道德之衰落常起于统治集团与既得利益之势利主义,此使彼等由私而愚,或由私愚而贪而暴,并污染社会,毒害性灵。此时常赖知识人提出因革损益之道以救之,通过社会之力以救之。如不能救,甚至知识人亦势利腐化,社会必乱(内战),而统治集团亦必终被推翻。而乱的时间和空间之久广,决于腐败程度之深广。然起而代之的新势力必为多少接受新观念,即新文化者。于是此社会仍有再兴、再治之可能。学问是一民族之实力,道德则是扶持力,所以善恶消长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。然一民族不是孤立的,他还有他的外部环境。各民族之兴衰、成败、治乱,相遇而相互作用时,造成世界史之变动。

五、各民族之文化成就及其命运,在世界史中结算。人类之心智相同,在相同自然环境下,各民族之文化表现极大之类似。然各民族之大小,以及

内外形势所造成的文化创造之机会,进步与落后之状态,相互间和平与战争之关系,战争胜败之结果,则大不相同。世界史是许多民族以其所创造的文化登场之舞台、运动会和战场,而各民族之文化力是其竞争力。于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之迟速,治乱,兴衰,及其相互作用,决定一民族之命运。

在历史之一定时期,一民族文化之发展兴盛,不仅造成自身之权力地位,而且其文化成就亦有为其他民族所仿效之价值,或进而扩张其文化之影响力,因而树立其文化的霸权。然此握文化霸权之民族亦常因垄断财富与权力而造成自身之腐败,或狃于一时成就之经验,不能进一步因革损益以适应新的需要,造成自身之衰落,内争,反抗而瓦解。于是此文化霸权可能为更落后民族所破坏,或受相等势力的民族之挑战,或被优势文化之民族取而代之。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之起落与转移中,造成许多民族之融合、扩大、分离、独立与盛衰,或不幸而使许多民族之人群及其文化归于沦亡与消灭。然一民族之文化如仍有价值,而此民族有独立之精神,自仍能经适当的因革损益而复兴。此种政治、文化霸权之兴衰与消长,造成世界史构造之变形;对许多民族而言,亦是其外部构造。我将世界史构造之变形分为九大时期。就将来而言,世界和平与人类毁灭皆有可能。

六、历史学之性质:是科学,文学,还是哲学?一切科学皆以概念概括事实,研究概念间之因果关系,以预见事实之因果关系。一切文学乃以想像组合形象,加以描写,诉诸感情,不必实有其人,或确有其事。史学必须描写历史上重要人物之活动,有同于文学,然必确有其人其事,且在事实之发展关联中叙述之。故史学有文学性而与文学不同。但史学之最大用处,毕竟在求一般人民生活方式之变动,即文化兴衰,国家治乱之法则,借以鉴往知来。故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。个别社会科学研究现代社会各部门(如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等)人类活动及其法则,一般社会学则是一种综合的考察,以社会组织、文化及其变动为对象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者,一是自然现象可作控制的观察实验,而人类活动仅能对若干可计算之标志加以调查,如人口、所得、投票率、失业率及使用访问、民意测验之类技术。而要研究社会之变动,自不得不研究一个社会的前期状态,此即历史。二是自然现象无所谓价值判断,而社会科学则不能避免价值判断,尤其是法学主要是一种规范科学。然价值标准之规范又如何研究呢?这可由比较各民族之价值观念,研究价值观念的变化,而求其不变原理,此即历史。此是说社会科学不能离开

史学。

可是,史学又与社会学及个别社会科学不同。他不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人类之活动的,而是对过去到现在人类活动之连续过程作一种通观,记述及说明现在之所以形成,因而考察其将来之可能趋势,俾能选择一较好之前途。首先,史学不仅研究过去之集体情况,且须研究有重要性之个人。此皆不能直接观察或询问者。其次,历史系由各方面的人力所构成,而人力如何使用之流动性甚大。故史学虽是一种科学却不能成为严格的科学。历史可以说明人群各种可能之前途,而选择之,又决定于人,此则每一个人亦有其或大或小之份量,个人与集团如何选择则与思想及价值判断有关。科学不作价值判断,而人类文化及其活动,前途之选择,根本包括价值判断,故史学必作文化价值之判断。所以史学必然成为文化哲学——文化批评之学。一切社会科学也都不能避免价值判断,故史学除自身为一种科学外,又为一切社会、人文科学之基础,犹物理学为一切自然科学之基础。

七、史学方法论。总上所言,史学研究治乱兴衰之故,因革损益之宜。此史学之性质,决定史学之方法。惟其史学是不严格的科学,必有严格方法论,俾能对可确定者确定之。自然科学方法以观察,数学,实验,推理,求精密之概念,及概念间之不变的因果关系。史学之目的与科学同,然历史事实不能直接观察,只能根据间接资料之史料,即文书与古物。数学与实验用处甚少,或根本无从适用。访问、民意测验亦无从适用。故史学主要是一种推理的科学。史学家据史料推理,有如法官依据证人证物判案。此种推理之所以可能,即因人性有基本之相同,而人类活动之各种方式,已有各种社会科学,如人类学、考古学、古文书学、社会学、社会心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提供比较的解释与说明。知识愈广博,愈有助于推理,避免误信和武断。

一般所谓史学方法指史料之批评、考证。此仅史学方法之初步,确定个别之事实而已。史学方法之第二步必须借助各种补助科学(年代学、考古学、古文书学等)及社会科学之解释、说明,将个别之事实连结为事态,尽可能看出事态之关联、构造与变化。史学方法之最后一步,在对于一时代一社会内部的构造(社会之道德知识状态、技术、制度、学艺)与外部的构造(地理的,国际的),内部的,外部的各种因素,以及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(模仿、学习、和平通商与战争)加以考察与联络,理解其先后的因果关联与其一定时期之总结果。此方法论之应用,证明道德与理性为文化创造之根本动力,势

利主义则为破坏力,并证明个人与民族求自由之愿望亦为历史法则。

八、历史学不仅要说明兴衰治乱之由来,最后还要评价文化之成就与得失,为因革损益之根据。此涉及科学技术,行为制度,文学艺术之价值判断。我由史学与科学、哲学之合作建立目的论,说明真善美之原理,而以正义、和平与文化创造力之解放为文化批评之标准。因果论的史学方法论与目的论的价值判断论合为理论历史学之基础。

九、全部史学方法之使用,皆赖比较之功。史料之鉴别须比较,事实之关联,变动,及其因果关系之判断须比较,文化之评价亦须比较。故比较实为史学方法之中心,使推理有其根据,其重要性更甚于生物学上之比较。

然史料愈广,比较愈周。此所以历史研究终必以一定世界史之知识为前提。过去之历史多为帝王之家谱,无关于一般人民之生活。后来又有以地理(巴克尔)及经济(马克思)解释历史者,此皆仅外内构造之一部分。近年来有行为科学派。其实行为科学只能说明一定之心理现象。人类之行为系在历史构造即文化方式中进行,以思想为动机,并具有价值之趋向。行为科学对此三者皆无用处,也就对研究人类及中国之前途没有用处。

以上纲要,包括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,历史构造之内部与外部,静态与动态,微视与巨视,故称“理论历史学”。此理论历史学乃由比较世界文化史与文化社会学之长期研究来,亦足以说明和预见世界历史之变化的。

### 本书之结构

过去想写一部世界史而未成,现在则应用我的理论历史学于中国史,要点如下。

一、中国历史就其外部构造而言,可分三期。甲、自远古至春秋为中国光荣孤立时期。起于本土(江河上游),在和平劳动中创造,使用表意文字的中国文化,给与中国文化以最基本特色。乙、战国以后,匈奴入侵,使中国历史进入亚洲史时期。丙、元明以后,是中国历史渐入世界史时期,而明清闭关,自限其智能,清代中叶以后海国东来,是中国历史被动的正式卷入世界史时期。(此三分法,是我在抗战后期慢慢想出来的。直到我写完本书上卷时,才发现梁启超先生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中早有类似分期。)

中国历史就其内部构造而言,可由中国国家性质、统治机构、经济程度三方面观察。以国家性质而言,由黄帝到尧舜,是部落同盟时期。夏商周是封建国家时期。秦汉以后,是统一的帝国时期;清代中叶以来,是此统一帝

国瓦解建一民主共和国时期,但遭遇种种挫折。

就统治的机构言,五帝时代,教权性的知识分子即统治者(主持祭祀者)。在三代,贵族知识分子为统治者。在战国时代,平民知识分子抬头,中国趋于无阶级的齐民社会和统一的郡县帝国。首先由于对外关系,武力重要性增大,武力组织者成为皇帝,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民参加政府。两汉以后,为皇朝与知识分子二元之局。皇朝之兴起与腐败,帝王与儒生之合作与分离,知识分子创造新文化,蛮族之入侵与同化,构成治、乱、治之循环。

就经济程度而言,三代是封建经济时代。战国时代都市勃兴,封建时代趋于结束。秦汉以来,中国大体上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。但腐败所造成之民变与蛮族入侵,以及明代之闭关政策,使中国未能向高级资本主义发展。西帝东来,日帝继起,阻碍工业之发展,进入殖民地化。

二、两汉是中国历史之模型。此后中国历史有三大循环如下:

秦汉——三国、晋——五胡、北魏、六朝

隋唐——五代、北宋——辽金夏蒙古、南宋

元明——南明、清初——鸦片战争以来

就以上第一期而论,秦朝建立统一,然其制度不能适应统一之需要,汉能革其弊,始能建立统一帝国。东汉因腐败而分裂,中国知识分子退而在野,创造新的文化。然晋人不克负荷,仍复腐败,天下大乱,五胡乘之而入中原。新的文化潮流与力量,再造隋唐之统一,而再反覆前期之过程。元明统一中国后,亦复如是。不过,清朝统一中国,到了十九世纪趋于腐败后,不仅有汉人之复国运动,而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了。中国历史之外部构造完全不同,也便不会有过去的循环了。

三、本书分三卷。上卷古代篇包括远古文化、文字发明,古典文化之形成与发展至秦汉时代。此中国文化因系在中国本土独立和平的对自然环境所创造,有无阶级,非宗教之人文主义之特色,复以表意文字凝结之,有极大之稳固性。此经三代发展为周代之古典文化,而在春秋时代开花。孔子为此古典文化之代表者、集成者及传播者。至战国,外而匈奴之威胁,内而都市之发展,促成秦汉之统一。秦滥用皇权而瓦解,匈奴之威胁更为严重。汉代能对内外情势为适当之因革损益,所以能上继先秦,下合六国之文化而发展一种“大汉风文化”,对周围亚洲诸民族发生影响力,同时亦不断吸收域外

文化之成份,使中国成为泱泱大风之国。直到清代中叶以前,中国社会与文化只是在此文化中之破坏与重建,所以汉代社会文化是中国历史之模型与骨干。此大汉风之文化,自是中国知识分子之集体创造。此“大汉风”一词虽是仿照德国史学家 Droysen 之“大希腊风”(Hellenism)一语之用法(此词意即希腊文物及其风尚之普及,狭义指亚历山大东征至罗马帝国成立间之希腊文化,广义则为与希伯来主义对立之概念),但大汉风之持续的效果却又是大不相同的。

中国文化之价值须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加以比较而定。巴比伦、埃及、希腊、印度之文化皆起于外来民族征服原住民及其文化而发展的,皆起于宗教与阶级。而中国文化则起于本土,起于史官,起于天文观察,故无奴隶制度,宗教观念亦淡薄,而表意文字更增其团结力。三代以来,神的观念日益为人的观念所代替。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同时希腊印度相比,我们的长处多于短处。希腊人的科学发展在大希腊风时代。但将我们大汉风时代与其相比,不如者只是几何学。而在其他天文数学工艺各方面,如张衡、刘徽等人之成就,在同时代希腊人罗马人印度人之上。而我们在人民至上和言论自由两方面之理论与实行,更非希腊人罗马人所能及。而太史公之史学,是要到十八世纪西方人始可望比肩的。

四、中古篇论三国至宋末。叙述之层次仍将如上卷。在过渡时代,则提出关系后来之重要事实,如三国前后,诸葛亮对曹操抗争之意义,诸葛之相业,三国之开拓,建安文学,荆州经学,玄学、史学之流传,九品中正与正始风气,佛教之东来与渐盛,塞外民族之酝酿新的风暴。而于一个统一的朝代,则述其时皇家与知识分子之概况,外围的民族,内部社会状况,民风士气,技术,制度,学术之成就;特别注意其能否对内外情势作适当的因革损益,以及在乱亡后复兴力量之由来。司马家乃曹操主义者,荒淫无耻,不知因革损益之道,只维持了三十六年之统一,而有永嘉之祸。五胡之由来与起伏,鲜卑南下后柔然突厥之活动,与后来之关系亦大。南北朝分裂后,北方士族之自保,中原士族之南迁,保持及扩大了中原之文化。北方礼学、南方玄学之发展,南北佛教亦分途发展,然又皆趋于合流,此隋唐统一之源泉。而促成此合流者则为史学。

唐代开国君臣是深于史学的,故知因革损益之道。为应付突厥而通西域,租庸调之制,科举之制,都甚成功,故能再建比汉代更盛大之大汉风或大

唐风之文化。运河开通后,继之以市舶司之成立,国内外贸易之发展使经济结构大变,唐初租庸调已不能维持了。唐玄宗在国力最富庶之时,不能为进一步之因革损益,唯用小人而肆奢侈。而此时阿拉伯(大食)已兴,其技术非突厥可比。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所败,安史乃乘机为乱(杨贵妃适逢其会而已)。自此北方残破为游牧民半游牧民活动之温床,而藩镇亦因此尾大不掉。中国经济文化之中心逐渐转移于南方,海外贸易由此益盛。此不仅为支持国用之重要来源,而且促进唐宋间之商业革命。飞钱、交子、会子先后出现,罗盘亦与海运俱来。但安史乱后,唐朝虽在财政上有相当之因革损益(税制、预算),然不足适应需要,而首先起来亡唐之黄巢,并非农民而系富商。中国再分裂为五代十国。首先是强盗朱温。后有沙陀之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,造成中国国防之致命伤,先后成为辽金之祸。乘南北朝大乱而兴的释老二教在唐朝仍甚流行,唐末尤盛。循此趋势,中国非不可分裂为许多民族国家。而商业发达之要求统一的市场,杜甫韩愈之再振儒学,与唐末五代印刷术之发达,则是宋代再建统一之物质与精神原动力,也是宋代文化学术发展之基础。然中国已失去长城之屏障了,先有辽夏两个外患。赵家惟惩藩镇之祸,以集权牵制为能,岁币外交为安;范仲淹之改革不行,王安石之改革不得其道转成小人聚敛之术,而外交上复无远谋,因成靖康金人之祸。幸此时中国之科学技术已有新的发展,海运亦增加财源,此加上长江之险,能与金人蒙古抗衡之故。然南宋唯以偏安为得计,自毁长城(杀岳飞),天下中分。贪风大涨,诛求遂急。既而蒙古灭金,已能“用北方之马力,兼中原之技巧”;及蒲寿庚以海舟降元,宋朝已非文天祥所能救了。

自三国至宋末,是欧洲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之时。在此期间,罗马帝国由军人专政而腐烂,蛮族开始入侵,采行基督教,帝国二分,西罗马终于被蛮族灭亡;其后三百年为黑暗时代。东罗马帝国保持古代西方文化之干枯形骸。西罗马之亡有如西晋,东罗马亦有似六朝。然西罗马死而不复生,西方归于日耳曼人;而六朝文化仍大汉风之流韵且甚活泼,且重造唐代宋代之复兴与光辉,此即中国文化稳固性之证明。在中国之六朝时代,为印度文化黄金时代之笈多朝时代。唐代,在印度为戒日王时代,为佛教最后之盛期;在欧洲先为黑暗时代,后有法郎克人之建国。其时世界文化史上与中国并驾而极活跃者,实为阿拉伯人,一时建亚欧非三洲大帝国,且能在叙利亚吸收大希腊风之文化,于败唐军后吸收大唐风之文化(造纸术自此西传),因而成其盛

大。而法郎克实在其包围之下。唯法郎克人在七三二年一战获胜，始得保持基督教之势力，而有夏理曼帝国，然亦方由草昧进于文明。至十字军之战，欧人始由阿拉伯人学习，三百年后有文艺复兴。综此期世界文化而论，欧洲除东罗马尤士丁法典外无甚可谈，印度佛学为中国所吸收，阿拉伯人方吸收中国之文化，中国之科学工艺哲学史学文学，皆为世界之冠。

五、下卷自元代至现在，我称近世期。首先我要说到，西方人多以一四五三或一四九二(发现美洲)为近代史之始，而以一八四〇年为中国近代史之始。在后一点，实甚荒谬，此乃以西洋人侵入中国以后，中国始由中古进入近代。其实西洋人之所谓近代现代，乃指其民族国家之成立，或其近代语言之形成而言。我以为近代史应以世界交通之形成为断，而此乃以蒙古混一欧亚开幕，而中国现代语言，省区画分，固亦皆由元代始。元代于世界建立“蒙古式的和平”，开东半球之海陆交通，促进西方文艺复兴。然在中国实行落后的四姓之制，迷信喇嘛教，而以江南为殖民地。此断不能统一中国。中国之民族主义运动遂亦发展于江南。及元人海运被切断，蒙古之四大汗国之崩溃由中国开始。中国由南而北之统一，亦自明代始。在世界大通之时，朱元璋不知利用开发，反行闭关之道，使中国人开先之航海事业，亦因“祖制”而中止，而西人则由航海而发展，此为中西盛衰一大关键。宦官贪残，八股士大夫之不学无耻，援韩之役，散兵溃卒散处辽东助满清以军力，而贪污诛求激成民变，造成满清入关之机会。满清虽为中国扩张版图，然一切继承明代政策，益之以文字之狱，知识分子不为八股之禄蠹，即埋头于文字之爬梳。文化创造力早在停滞状况，遂使世界大变之时，中国人失去应付或因革损益之能力。

此近世期与西方比较，可分三阶段。自元代至明代中叶，是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时。元代继承宋人文化，水准远在西方之上。这只要想到蒙古的世界武力，李治、郭守敬的数学天文，马可波罗虽然夸张然而亦见显著悬殊的比较，即可了解。明朝接收元朝的遗产，一时富强甲于天下，这只要想到十五世纪郑和的世界航海，即可了解。但是明代以来，中国方面，因闭关、八股、太监之三害在精神上趋于萎缩；王学乃针对此弊而兴，然因无物质方面之基础未能结实。另一方面，欧洲人则有三利促进其发展。一因十字军及“蒙古的和平”，十四世纪中叶以来，义大利诸城市已开始一新的思想运动，即所谓文艺复兴。二为英法百年战争终结，欧洲成立两个民族国家，继

而西班牙葡萄牙由回教徒解放而成立民族国家。三则葡西两国从事航海，宗教改革促进民族国家之航海与殖民竞争，促进知识的追求。“知识即权力”的口号，促进了科学之发展。

虽然如此，十五世纪土耳其人以优势船炮攻陷君士坦丁。至十六世纪，苏莱曼的土耳其还是欧洲最强之国。明清之际来华西士的科学知识，其平均水准并不超过中国，如过去许多人所皮相观察的。一方面，中国之停滞，另一方面，西方之突飞猛进，在一六〇〇年双方犹在平等状态。葡萄牙人逐步夺取回教徒的航路，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大破土耳其海军于勒班多，十七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后的继续进步，才使西方确立其技术的优势。虽然如此，明末诸人因外患内忧的刺激，西学的启发，在学问亦有新的努力（复社）。而在一六六一年，郑成功仍能击败当时海上之雄的荷兰。此见其优势是有限和不定。

然自清人入关后，中国有四十年之满汉战争（自扬州七日，至三藩之战与合并台湾），及继续的准噶尔战争与回疆战争，以及文字狱。而西人则设立科学会（如英国王家学会），有计画的发展航海贸易（如克伦威尔之航海令），有数学上决定性的进步（微积分），而英国在名誉革命后即保持国内的长期和平，一意对外发展。这两种方向不同的活动，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飞跃发展而不遇丝毫之阻力，才使西方在技术上决定性的压倒东方。虽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仍对中国文明表示极大之敬意，实际上他们在知识上已超过中国了（四库全书是我们知识的代表）。美国之独立，英国蒸汽机开始的工业革命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法国大革命，三者同时促进了高资本主义和西方市民阶级的财富权力，而此对前工业的东方则变为帝国主义。此时欧洲列强在瓜分土耳其，英法在争夺印度。马戛尔尼早已看出西兵东来，中国军队不堪一击。于是拿破仑战争终结后，英人以西方领袖鼓浪东来，将对付印度和土耳其的办法施诸中国。这一世界历史形势之转变不仅为当时“满大人”所不知，就是今天只知仅凭《夷务始末》资料，“现代化”的观念，来讲禁烟和“剿”“抚”得失，讲近一百余年中国历史的人，也只是管窥蠡测的。

六、由此可见，中国文化与国力，在世界长期处于先进地位。在科学民主方面亦复如此。但十七八世纪以来，世界发生大的变化。西方诸国日益取得技术之优势，终于征服世界，中国成为落后国家。此其原因，即中国之

闭关八股造成停滞；而西方之航海与科学造成资本主义之发展，促进工业技术之进步。东方愈落后，西方之发展亦愈为迅速。我们在过去所遇外力，为塞外游牧之族。我们因革损益之道大致不差，所以能够发展大汉风的文化。中国即令瓦解分裂，乃至受外力或外来思想之征服（如佛教），但我们终能对自己文化再作因革损益，发展新的文化运动，重建中国人之统一的精神，复兴国家，如唐，如宋，如明，皆是如此。近百余年，我们首先遭遇的外患为海上工业国家，遂成为被侵略的对象。落后不是不能克服的。决定的失败在我们知识过于不足，不知正当的因革损益之道。在开始，还想以传统的应付匈奴、突厥和契丹的办法抵抗西方海国。等到这完全失败后，便完全丧失抵抗的意志。

### 新 版

新版与原版不同之处，除了更正错落或模糊之处以外，在内容方面，我仅在原书每一页固有地位中使原来的意思更为清楚。这包括用语轻重之改动，原文前后之移动，间有数字到四五十个字之删除与增加。又图版增加了两面古代舞图。又插图增加了一幅《丝道图》（三六七页），又原来我自画的《汉唐西域交通线图》甚为拙劣，换了一张，并加了一张《葱岭图》（五九一页）。而此三图，是应当合看的。又原书引用来源附于正文，附注大都是说明正文的。有五六个注或因有新情况，或有新阅览，应予说明。首先是第六章注五二，论述外国之汉学研究者。在我写完此书时，只看到李约瑟《中国科学与文明》第一卷（一九五四）。我在书中正文提到他，注五二说西方汉学家应推沙畹、洛佛、高本汉三人最为精博。但到一九五六年李书出第二卷，一九五九年出第三卷，去年出到第五卷，我要说这确是不朽的大著。当然，他的书是取材于西方以及东方汉学家的书，那些西方汉学家也有许多是得中国人合作的，而李氏自己的书也得到中国人的合作。但他组织为堂皇之大著，实西方汉学家著作之最高最大成就，亦见中国文化之辉光。我虽然来不及引用他的书中材料，不过他注意到的事，我的书中也都注意到，在此新版中，我只引用他的两句话，一即中国的赤道天文学是欧洲现代天文学所采用的。二为磁学与声学（等律），中国均有启发于西方。李氏大著在未全译之前，可看他的“Science and China's Influence on The World”（R. Dawson 编，“The Legacy of China”，Oxford, 1964）。而其书最精彩处，我在《书经日食》中有简要介绍。

其次,与西方人汉学著作有关者,在注一八九提到西方关于中国天文学著作,至少尚应加:

Herbert Chatley,“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”(1939)

Henri Maspero,“L’astronomie chinoise avant les Han”(1929),“Les instruments astronomique des chinoise au temps des Han”(1939)

Giogio. Abetti,“The History of Astronomy”(1954)(关于中国之论述)

又注二〇二关于中国艺术著作,至少应加:

W. Willetts,“Foundations of Chinese Art From Neolithic Pottery to Modern Architecture”(1965)

Werner Speiser,“The Art of China: Spirit and society”(1960)

又上册第五章注八,说到联合国文教会世界通史计划,该书已在一九六九年出齐,其起讫与当时略有出入,因有余白,已补记于原注之后。

还有第六章注一八二、注一八三,在我看了朱载堉《乐律全书》,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论中国音乐,及李约瑟书第四册后,有所删增,并改用董榕森先生一图。又补记一九六〇年国际长度定义。

此外,新版增加了一个索引。初版出后,我决定补一索引,并已请人在香港就近为之,作好后已将索引稿寄我。我记得似乎未曾整理,最近拟清出整理,竟未发现,因曾迁居,方疑遗失,但又发现香港一种版本上记有“上下二册索引,兹因某种原因,索引原稿失去”之语。不得已,特烦杜聿新先生重新作一索引,特志最大谢意。

看历史书手头宜有一中外大事年表。虽然书中是用同时比较法的,【本书】已有两个对照表(一九三页以下,五三二页以下)。兹将旧作《历史哲学概论》中的中外文化史对照的简明年表稍加补充,分三期刊于每卷之末。欲知年号,可参考《辞海》附录。与外国对照可看 William L. Langer,“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: Ancient, Medieval, and Modern,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”[1<sup>st</sup>-5<sup>th</sup> ed., 1940—1980]。

一个人总是自己的书的最坏校对者。此书初版得无大误,系赵滋蕃先生之力。初版出版以后胡哲齐先生寄来一刊误表,曾于再版时据以改正。但杜聿新先生在第三版中仍发现错字不少。重印本系就杜先生本付印,又由梁先进先生负责校对,均此志谢。

最初鼓励此书写作的黄震遐先生在前几年谢世,这是我在重印此书时深为悼念之事。

我所研究的历史,不是历史上若干事实之考证,说明或讲法的问题,而是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万世存亡兴废的问题。二十年前我曾题此书曰:“妾道积污成此局,栖皇自可傲群奴。春秋自此开生面,不负书成见白须。”

今重刊旧著,再题词曰:“曾用苦心酬国命,欲陶气运借春秋。暮年击鼓催功竣,好看景星焕九州。”(《史记》天官书:“天精而见景星。景星者,德星也,其状无常,常出于有道之国。”)(一九七六年十月)

